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近十年来,包括灌溉工程遗产在内的水利遗产的挖掘与保护,越来越受重视。遗产的挖掘、评估、阐释、保护理论和技术研究实践的体系化程度逐步提升,遴选申报与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充分展现了我国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成就。

——编者



华北抗战的真实记录

陈亮

坐落于北京卢沟桥畔宛平城内街101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对外开放。馆内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全景式展现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英勇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军民是如何战斗、学习和生活的呢?纪念馆珍藏的《一二〇师在华北》大型系列木刻组画,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华北战场的历史场景。

组画由八路军第120师司令部政治部秘书李少言创作,原有42幅,只有34幅保存下来。每幅木刻由晋绥根据地特有的麦秆和乌兰草混合制成的土纸贴裱,边区自制油墨印制,下方有李少言手写的标题及内容。组画《雁门关战斗》《陈庄战斗》《水上游击战》等再现了八路军浴血奋战的激烈场景;《运动大会》《斗笠》《捉奸》《统一战线工作》等反映了华北战场的方方面面;《学习》《传达》等突出了八路军注重思想政治学习的优良作风;《露营》《夜行军》《野外演习》等刻画了八路军艰苦的军旅生活。整套作品结构巧妙,刀法细密,线条流畅,朴实无华。

这套木刻组画是为迎接党的七大召开而精心创作的。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非常关心组画的创作工作,对李少言的每一幅草稿都不止一次提过建议。组画内容丰富,生动全面反映了第120师在华北战场抗击日寇、创建晋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从1940年1月至1941年2月,创作期间经过两次反“扫荡”战役,每一幅木刻都是在行军打仗间隙构思、刻制、修改完成的,都经过抗日硝烟的熏染。它们不仅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红色艺术珍品,被誉为“美术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2月1日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手稿,见证了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发展的艰辛。手稿用小楷毛笔写在8张毛边纸上,纸张已有些发黄,部分印有水渍,虽有大量修改涂抹痕迹,字迹仍清晰可辨。报告叙述了冀热察游击战争发展形势,认为游击战争大有前途。2月10日中央军委的回电抄件,用蓝色钢笔书写在电报方格纸上,字迹工整。回电抄件肯定了萧克的报告并指示:“同意你们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望遵照坚决执行”。这些报告手稿和回电抄件是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献。1939年2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成立,经过广泛调研、仔细分析,确立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发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平西、平北、冀东终于连成一片,形成三大块互相邻近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地数量庞大的日伪军。三块根据地互为犄角,使日伪占据的北平伪军完全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

展柜里陈列着一件对于今天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器物——煎饼鏊子。它的主人叫邓玉芬,是北京密云张家坟村的一名普通农妇。邓玉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救治八路军和县区干部。密云山区条件艰苦,身体虚弱的八路军伤病员长期食用粗粮,不但难以下咽,营养也跟不上。邓玉芬特意养了几只母鸡,用鸡蛋给他们补养。她按以前贫苦人家改善生活的办法,粗粮细作,找来煎饼鏊子,支上火,将小米、玉米等配上鸡蛋,做成营养丰富、香甜可口的厚煎饼给伤病员吃。而她自己和孩子则吃粗粮、树叶、野菜搭着充饥。邓玉芬被誉为“英雄母亲”,她誓死不当亡国奴,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锈迹斑斑、制作简陋的煎饼鏊子,是八路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

6700平方米的展厅内,1170幅照片、2834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影像,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让人们牢牢铭记这段历史。

(作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



1942年李少言创作的版画《重建》,表现的是日军扫荡后八路军帮助根据地群众重建家园。

陈亮供图

灌溉工程遗产

深厚而丰富的灌溉历史文化

李云鹏

2022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灌溉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由于季风气候影响,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都需要灌溉工程来调节水资源的时空配置。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灌溉工程的建设和运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4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设立,使这个遗产类型及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古代灌溉工程进入大众视野。截至目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项目已达26处,是世界上灌溉类型最丰富、工程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其中一些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等,同时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留存至今的灌溉工程遗产,承载着传统治水技术、经验和智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最典型的如都江堰、郑国渠,与灵渠一同被誉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孙叔敖修建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境内),为楚国的经济发展和迁都寿春奠定了基础。造就了“塞上江南”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对维系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具有战略意义。从易耕易灌的平原盆地到高山丘陵、湖滨滩涂、边陲荒漠、沿海卤地……灌溉工程遗产的地域分布,也从侧面展现了中华先民不断开拓生存空间的艰苦奋斗历程。

悠久的灌溉发展史,还衍生出丰富而独特的区域文化。北方干旱地区水资源竞争激烈,促使一系列用水管理制度诞生,如山西洪洞县霍泉灌区《霍渠水法》。南方地区也有“堰规”,如浙江丽水通济渠的“堰规”,涵盖支渠分水口规格、轮灌制度、岁修工役和工料如何摊派等。此外,能够见证灌溉工程历史的古代水利管理建筑、庙宇等纪念性建筑,相关历史文献、碑刻、档案,工程所承载的传统水利科学技术、民俗节庆……这些都是灌溉工程遗产的组成部分,共同展现了其丰富内涵。



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桔槔”俗称“吊杆”,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原始汲水工具。这里地处山间小盆地,地下水量丰富,埋深浅,村民打一口当地称作“拗井”的井,用桔槔从井里汲水,通过小渠流入田中进行灌溉。据记载,200多年前当地居民就已对地下水循环有了科学的认识,并能通过人为干预增加井灌的可用水量。在诸暨市泉畈村的遗产核心区,至今仍有100多口拗井在发挥作用。

灌溉不仅指供水,也包括农田排水,兼有特殊环境条件下灌排区域土地的整治与改良,包括圩(围)田、梯田、垛田等。江苏兴化地处黄河夺淮之后的洪水走廊,俗称“锅底洼”,由水系、圩坎、垛田构成的灌溉排水系统,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也塑造了良好的生态和人居环境。灌溉工程遗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尽可能利用自然条件,以最小的工程量和成本实现最大效益。优秀的传统灌溉系统,取水方式和工程型式都相对温和。最典型的就是无坝引水形式,有坝引水往往也只采用低坝。工程常用的材料和构件,与生态环境良好融合度。如都江堰的竹笼、杩槎,南方灌渠广泛使用的干砌石衬砌,北方灌渠广泛采用的植柳护岸,使渠水与土壤水之间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水量交换,长期运行也很少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古代人工渠系逐渐融合为自然地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灌溉工程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并塑造出优美的水利景观,其理念和实践,对现代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仍有借鉴意义。

至今仍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它们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而且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综合效益。

以目前中国的26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例,灌溉面积合计约230万公顷,相当于100多

个大型灌区。维护好这些传统灌区,比新建灌区投入的成本要低得多。很多古代灌溉工程还兼有其他重要的水利功能。如广东佛山的桑园围,至今仍是围内顺德、南海两区的防洪保障。浙江龙游的姜塘堰、山西洪洞的霍泉等,兼有水能利用、城乡供水之效。一些灌溉工程遗产对灌区生态环境的维系功能同样不可或缺。在新疆,一条坎儿井就能在戈壁滩塑造一片绿洲,堪称生态命脉。

灌溉工程遗产还是一种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都江堰、灵渠等早已是著名景区,近年来,四川乐山东风堰、浙江湖州太湖溇港等遗产地的水利特色文化旅游也在快速发展,湖北襄阳的长渠等成为国家水情教育基地。一些灌溉工程遗产还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为灌区农产品赋能增值。依托灌溉工程遗产灌区,一些集生态农业、采摘体验、研学观光、民宿餐饮等为一体的综合农庄开发模式逐渐发展起来。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探索出一些宝贵经验。较突出的即研究支撑与制度保障。伴随着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关于灌溉工程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发展起来,进而指导实践。目前,绝大部分灌溉工程遗产已编制并颁布实施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有的还通过地方人大立法增加了法律保障。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中国深厚而丰富的灌溉历史文化,形成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利用的社会合力,让这些宝贵遗产更好地融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广大群众。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图①:福建莆田木兰陂。图②:浙江诸暨泉畈村,村民正在使用桔槔从拗井里提水进行灌溉。图③:重庆秀山巨丰堰三拱桥渡槽。

李云鹏供图
版式设计:赵偲汝

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

中国灌溉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悠久。良渚遗址考古发现数万斤碳化稻,表明当时的水稻种植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这离不开灌溉的支撑。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具有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综合功能。杭州临平镇的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水稻田,有明确的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3600多年前的郑州商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的灌溉渠系,2200多年前的淮阳于庄汉墓出土的井灌模型,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灌溉发展的延绵不断。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曾设“稻人”这一官职,专司灌溉管理。这些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反映了灌溉的发展脉络及重要地位。

灌溉工程的建设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之一。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灌溉工程,往往奠定了当时一地乃至一国的经济发展基础。



太平遗址

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新突破

王小庆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在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发现。因其重要性,陕西省专门调整了斗门水库岸线,让遗址具备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条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21年3月入驻,正式启动太平遗址考古工作。

说起斗门水库,西安之外的人可能很陌生,但说起昆明池,大家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昆明池是汉武帝在上林苑先后两次兴建而成的大型湖泊,唐以后日渐干涸。太平遗址正是在勘探寻找昆明池东岸线过程中被发现的,目前已完成勘探面积4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6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墓葬、水井等大量遗迹。出土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玉器等,测年数据约为距今4150至3700年前,属于客省庄二

期文化,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

关中盆地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都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辐射四方、涵养中华文脉的重要区域。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关中盆地,孕育了河谷两岸数不胜数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遗址。过去百年的考古工作,完整揭示了关中盆地自万年以降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从距今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4000年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一直到周、秦、汉、唐等诸朝代,为我们展现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画卷。但在太平遗址被发现之前,画卷上还缺失了夏商周时期的大型都邑遗址这一环。

已经出土的玉璜、玉璧、玉刀、玉圭等玉器和玉璧芯、玉料,构成了完整的玉器生产操作链,表明太平遗址有成熟的玉器作坊。太平遗

址出土的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最令人惊喜的是一件陶铃。同类型器物在关中地区罕有出土,但在周边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夏代早期都城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均有发现。这样的联系意味着,太平遗址也许同样具备中心聚落性质,与中原腹地关键区域有着交流碰撞。

太平遗址考古采用“边考古、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田野考古方式,考古团队成为多学科合作、多团队攻坚的综合体。田野考古数字化管理系统的采用,使太平遗址的考古站在了一个高起点。有了这个系统,卫星影像、无人机影像、遗址空间数据、属性数据等多种数据源,可以展现在一个平台、一张底图、一个浏览窗口中,既能够实现有效的数据收集与统一管理,又能够对考古过程进行集中监管。

3D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了记录手段的重要变化。在太平遗址,发掘现场的各个角落都

被全息记录、沉浸式展示,使各种遗迹现象得以重现。在裸眼3D的环境里,我们可以对各类出土文物进行平移、转向、缩放、对比等操作。高精度的大图像,确保实物细节被最大程度还原,使展示突破了时空限制。

目前,新一季的田野考古正在进行。已揭开的“冰山一角”足以让我们相信,考古的一步进展,会为我们了解关中盆地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时期的社会转型提供更多实证。

(作者为太平遗址考古队队长)

考古进行时